

常熟碑刻



常熟碑刻

撰文：周公太 陸晉基

攝影：王路明 徐振珠

版面設計：湯志明 鄭建東

校對：呂霞

常熟碑刻始印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编印单位：常熟市碑刻博物馆

承印单位：常熟市印刷二厂

印 数：2000 册

印刷日期：1993 年 11 月

准印证号：苏苏虞新出准字（93）第 086 号

前　　言

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在常熟這方風景秀麗、物產富饒、人文薈萃的土地上，積聚着自商末仲雍讓國避居、春秋吳國道客東南以來數千年時間里，先民們所留下的極其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這些遺產體現在物質上，主要是衆多的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觀。如歷代墓葬、歷代寺塔、亭臺樓閣、經幢石刻、古樹名木、博物館藏品等。然而，在上述文物中，能夠側面反映常熟一個時期政治軍事、經濟水利、文化藝術及宗教民俗等面貌的，卻需要數碑刻。因為，凡碑之所刻大都是當時邑內發生的較為重要事件和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記事，或征稅納賦、開荒墾田，或築城浚河、修寺蓋廟；或祀典學宮書院、重建儀門倉廩以及鄉規民約、追思先賢、書畫家墨迹等，洋洋乎大觀，一律一編，一事一記，莫不循本溯源，備載其詳，可謂歷史重要之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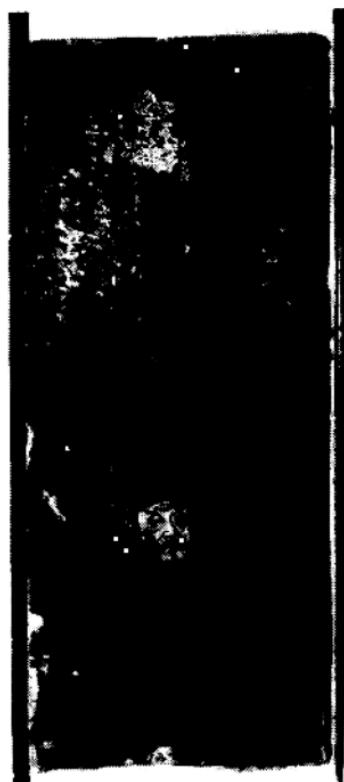
常熟的古代碑刻門類既廣，數量又多，但長期來因年月和建築的變異，有的漸湮人為毀損，有的散處城鄉各地。因而，自七十年代起，文管會始廣為搜集保護，其中黃步青、沈偉甲、徐振球等先生用力甚勤，各界有識之士不斷提供協助。經過日積月累，至一九九一年五月，在歷年考古發掘和社會征集所得唐宋元明清石碑 280 組塊、墓志銘 400 餘方的基礎上，經市政府文化局批准正式成立了碑刻博物館。

碑館位於常熟古城標志——南宋方塔之后院，采用蘇南古典園林格局，由三個展廳、總長 160 余米碑廊及亭、廊、池等景點所組成，佔地約 3500 平方米。與方塔前后呼應、迴廊曲折、環境典雅，是人們休憩和了解常熟歷史的重要參覽場所。駐足其間，細品品賞其文學、書法及篆刻藝術，當會得到一番美的享受。

宋歐陽文忠公像石刻

此像原系翁同龢手摹本，清光緒二十七年（1891年）六月，由邑人篆刻名家趙古泥鑄之于石。

像為半身，神態端莊凝重，面部線條采用陽刻，技法高超。上首附有吳鴻倫所書《宋文忠公贊》一篇，下端則有翁同龢甥俞鐘鑾所撰題記數行。歐陽修為宋代大文學家，傳世畫像多種，但俞記卻稱此像“得于新鄭守墓者，屬廬山真面”云，值得研究。



宋蘇東坡書法石刻

內容系蘇軾于宋元祐四年(1089)二月，書題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烟江疊嶂圖》詩一首。王晉卿即北宋名畫家王詵，其所作《烟江疊嶂圖》世傳有數本，皆筆意古雅，墨暈精妙，深得唐人遺法，畫后有蘇軾題詩。但按此幅所鐫時間，應為明萬曆間吳中王世貞所藏本。

《清河書畫舫》稱：“東坡長歌一首，淋離委曲，尤為遒勁刺眼”，是書可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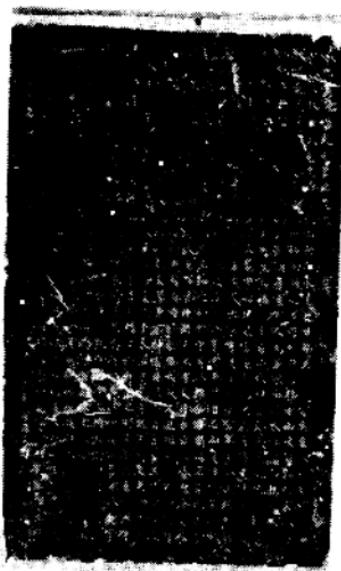
石為明嘉靖間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邑人嚴訥從蘇書真迹摹刻，曾先后藏嚴氏讀書山館及祠堂等處。



宋乾元宮興造記碑

乾元宮，原位于虞山東南嶺辛峰亭下。據縣志載系南朝天監中，漢張天師第十二代孫張道裕所創建，初名招真治，簡文帝曾賜玉案及鐘各一，并撰《招真治碑記》，后改稱乾元宮和致道觀。自唐宋以降，屢經擴葺，一度規模壯觀，成爲江南著名道家宮觀，清咸豐時廢于兵火。

此碑爲宋崇寧五年(1106)，由郡人沈洞撰文并書，姑蘇申屠宗震鐫刻。內容記述了乾元宮歷史及其興衰變化，涉及山水地理、社會風俗等，是研究常熟古代道教史的重資料，亦爲境內現存年代最久的碑刻之一。



元 聖 旨 碑

碑首正中鐫“聖旨”兩大字，傍對稱淺雕四爪游龍各一條，下刻聖旨兩道。一為元中統二年（1261）所頒，內容系禁止諸官員、使臣、軍馬等駐扎于宣聖廟內，并不得在廟中進行審理詞訟和聚眾飲宴等。其二為至正二十五年（1288）所頒，內容系蠲免秀才一切雜泛差役，允許在籍秀才從事商業活動，并再次禁止使臣等官入廟非禮騷擾等。

據《元史·選舉志》等載，元太宗六年（1234），在滅金取得燕京后，即采納宣撫王楫之建議，將全國的樞密院改為宣聖廟，以示尊崇孔子。世祖忽必烈統一中國后，又多次下令保護廟學，以示重視地方教育。其目的當是為了取得漢族知識分子的支持和信任，以鞏固政權。

此碑高達二米余，文為楷書，四周繞以淺刻雙綫寬邊框，框內滿鐫如意雲寬紋，刀工精湛。應為下第二道聖旨時刻成。



元倪瓈叢篁古木圖石刻

倪瓈，(1301—1374)，元代大畫家。出生于無錫地區豪富之家，雄于資財，喜與名士往來，后社會動蕩，遂賣廬散資，遁迹于村舍、寺觀間，因有“倪迂”之稱。

此圖原系倪瓈為都司劉元暉舊作。明洪武二年(1369)，其六十九歲高齡時，與劉元暉、鄉教授張德機等人雅集于高士良常家，應元暉之請，復題七言詩一首及跋記于畫上，以寄友情。畫面以禿筆繪枯木一枝，叢篁相伴，充溢秋冬蕭瑟蒼茫之氣，風格特異。另有梅隱叟詩跋一篇。

畫在清代晚期曾為常熟曾氏所得，并請蘇州懷米山房摹刻于此石，真迹今收藏于南京博物院。



明重修廟學記碑

常熟廟學，歷史悠久，創始于宋代至和重修于開禧、端平間。明初，文教聿興，復爲縣學。宣德時，西江羅汝寬來典儒學教諭，見學宮建築久受風雨侵圮，乃斥資循次修葺，后縣丞李子廉、主簿郭南等縣吏感慨羅氏用心之勤，各捐俸以助。時正朝歸省墓之邑人吏部稽勳司主事錢衡亦率邑人竟爲輸財，合力將禮殿新之，并配全像設章服、帷幕器用等物，使廟學重放華彩。據載，此役由吏民發起，而未耗官費一文，常熟崇文之風，于此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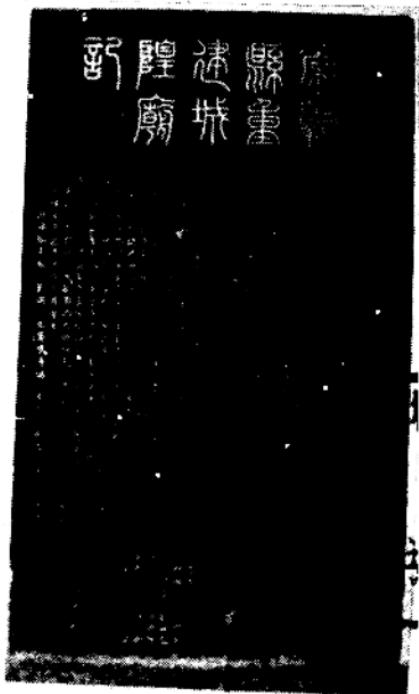
碑刻于宣德九年(1434)，由大學士楊榮撰文、邑人翰林院修撰張洪附跋，原在文廟戟門東側。



明重建城隍廟記碑

明代初年，朝廷下旨詔封天下城隍神，洪武三年（1370），常熟知縣田義即南朝東靈寺廢基，改建邑城隍廟。歷七十余載，至正統時，廟構建築朽蠹剝落，日就傾圯。按明之制度，新官上任，必先謁廟，與城隍神立誓，期在陰陽表里，以安下民。知縣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遂捐俸以倡，發動僚屬及邑民相與資助，將廟修葺一新。

此碑系正統七年（1442）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邑人吳訥撰文，鄒胤書，記述了邑城隍廟之興衰變化和此次修建始末。碑原在廟基。



明尊經閣記碑

常熟縣學，首創于宋代至和間，重建于端平初，左廟右學，設有明倫堂等。明正統時，知縣郭南將明倫堂修之，又拓附近民地，重建射圃，教諸生習射。正統六年（1441），縣丞陳澄提出郡庠有六經閣，邑庠亦建藏書樓，而常熟雖有太祖所頒《大明律》及成祖《五經四書大全》等集，但俱置于廡下，頗難保護，特請建樓以藏之。郭南深以為然，遂與陳澄率先捐俸，邑士民踴躍贊助錢米，建成閣五間和夾室二楹，取名為“尊經之閣”，從此，諸書得以安置。

此碑立于正統十三年（1448），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邑人吳訥撰文，江陰嚴雍篆額，庠生張緒書，記載了此次建閣始末，并對邑學源流多所敘述。碑原在邑學基。



明張氏預囑碑

此碑載明代早期，匠戶張世榮雙親早亡，家道衰微，自幼隨繼母生活，成年后又頻服官役，為維持家庭計，先后娶四妻，生育五男二女。由于其艱苦奮斗，創建了一定的家業，但為防止歿后子女爭奪財產，故特與發妻周氏預立分割文書等。

張在碑文中回顧了繼母及諸妻對家庭所作之功績，又基本一視同仁地詳列了分割各房子女財產數；同時亦具明了各人應承擔的瞻養長輩、祭掃祠墓等責任和義務；勉勵子女要勤勞持家，精誠團結。

碑系景泰七年(1456)邑庠生蔡瑢書、王鏗鐫，原在西門外寶岩張氏祠堂，為邑《金石志》所失載。其內容對研究明初常熟匠戶服役赴京營造以及社會家庭結構、民風民俗等有一定的價值。



明天文圖石刻

共分圖及跋文二部份，系明正德元年（1506），常熟知縣計宗道在弘治間知縣楊子器所刻天文圖遭到磨損的基礎上，命工重鑄。

是圖基本按照《宋史·天文志》并參考了《甘石巫氏星經》所刻制，個別地方的準確度略低于現存蘇州的宋代石刻天文圖，但卻訂正了蘇州圖的較多缺誤。據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研究後認為，常熟天文圖是繼敦煌星圖、新儀象法要星圖和蘇州天文圖之後的又一幅重要石刻星圖，在我國天文學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下部為計宗道所撰跋文，記述了圖之成因。四周布以雲霓紋，刻工極精。

此石原立于邑學禮門左側，一度佚，建國後在學前小學重新發現，由文管會建專房保護。



明重建崇福庵佛殿記碑

崇福庵，原位于常熟南境昆承湖畔，系宋代嘉泰初里人蘇氏舍宅建，故俗稱舍宅庵。歷元、明屢有興廢。

此碑刻于明正德七年(1512)，由邑人工部員外郎錢仁夫撰文，吳門著名書法家祝允明書。首部鐫祝篆書《重建崇福庵佛殿記》額，左右各刻一鹿，形態生動，下部為楷書碑文，共達五百余字，內容記述了庵之創立及前代修建始末。

祝允明書法，向以狂草居多，楷書少見，此書用筆筋骨內含，古樸厚重，深具晉唐風格，當為其壯年力作。碑原在昆承湖南新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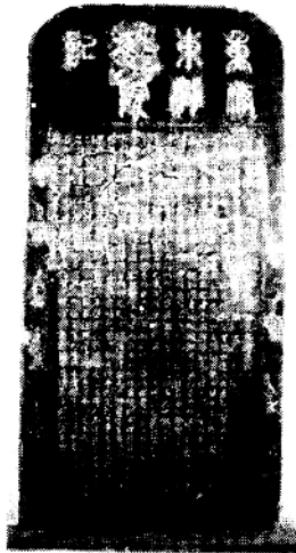


明重修東湖書院記碑

書院是中國古代私家講學之所，代有興衰。明初，因朝廷亟需人才，科舉盛行，一般士子皆聚于學宮，故至成化后，書院得以復興。常熟自元代起始在城內建文學書院，明代見于記載的亦僅文學和東湖書院兩處。

該書院位于東鄉古里湖口村，原為三官堂，弘治間知縣楊子器令毀鄉間祠廟，工部都水司郎中、藏書家里人錢仁夫請將此堂改為社學，內設孔子小像，延師授課，生徒日眾。正德中又加以拓新，取名東湖書院，曾刊行書稿等。

此碑記述了書院之創建始末，立于正德十六年（1521），由常熟知縣劉乾亨撰文，錢仁夫書。碑原在湖口。



明重建常熟縣城記碑

此碑立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系邑中名儒、時任翰林院學士瞿景淳撰文，吳門著名書法家文征明書并篆額，刻石家吳蒲所鐫。

文記載并歌頌了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時，知縣王鉄為抗御倭寇入侵，不畏艱辛，親率吏民重建常熟縣城之始末及其功績。通碑高達三點五米余，氣勢宏偉，額頭淺雕雲霓仙鶴紋，四周繞以陰刻卷草紋綫框。書法系文氏八十高齡時作，行楷秀逸，揮灑自如，與瞿之清新文辭、吳之遒勁刀工，三者并佳，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

碑原在城西王鉄褒忠祠內，建國后曾由文管會建專房保護。

